



“天人合一”观照下的“三维整合” 翻译方法论研究^①

——以《故都的秋》为例

◎陈菲菲

1 引言

整体思维取向的“天人合一”认识范式是中国哲学的经典认识构式与样态，是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哲学概括和精神格局，纵贯于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写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知北游》中记载“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在《齐物论》中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随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思想都鲜明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崇尚“天人合一”而致“圆融化生”的整体至高境界。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天人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和谐贯通、共生共存。因此，它与西方二元对立哲学认识样式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蕴涵着温情化互为人道关怀，是对科学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的另类思考，亦是现代重重生态危机下的救世哲学。

钱穆（1991：93）强调，“‘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体现出对于生命和自然本性的终极体悟，是至上精神与真理的融合、天道与生命的融合，它的研究触角早已延伸至哲学、文学、美学、建筑学、生态学等领域。在翻译研究层面，也已有不少学者以“天人合一”为研究范式进行了一些探索，这些尝试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深了学者对翻译本体论的认识。可以说，“天人合一”认识构式与样态一直是中国思维范式的主流认识形态与价值取向。

本文在这里虽沿用西方“生态”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和认识构式是不同于西方生态科学思想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它是“了然天地之道，法天地之道”、人与之无间相融一体的认识构式和样态。故基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哲学认识论而构建的“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是不同于基于科学思维的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不带有后现代

^① 本文为2020年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泛在网络背景下大学英语3D互动教学模式研究”（SGJ2039）之阶段性成果。



去中心“三维度”选择性、适应性的认识构式与样态，而是“三维互为整合”整体致一旨归的翻译方法论，是建构认识样态的翻译方法论，是对生态翻译学中“三维度”选择性、适应性认识构式与样态的反思和重构。故用其来探析汉语经典文本的语言翻译行为和评判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天人合一”观照下翻译学的生态认识观

纵观中国翻译史，趋一和谐一直是历代翻译活动的言语实践信条、指导原则和审美追求。例如玄奘“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梁启超 1989：29）。郑海凌（1994：5）认为“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征。刘宓庆（2005：50）亦认为自玄奘的“圆满调和”后，中国的传统翻译“风格、思想大定，后世的翻译主张均没有脱离圆满调和或和合调谐的传统主旨”。吴志杰（2011：14）阐释了“和合翻译观”的构建理念，“提倡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其目的便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刘瑾（2015）细梳了季羨林先生的翻译思想，提出其独特的“翻译和谐观”，给翻译研究打开了思路和视野。而胡庚申（2019：10）运用西方生态学科学义理所创建的生态翻译学亦部分吸收了“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中庸之道”等东方生态智慧。

由此可见，圆融调和认识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主要精神内质。而历代有关所谓“和谐”翻译观的认识中，皆蕴含“谐和趋一”的人文思辨的认识样式，为翻译言语实践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翻译本体论的静态僵化性承诺，既认同“语言”意义，又认同“言语”意义，既讲“和谐”，又讲“趋一”。

然而，根扎在科学思维和后现代土壤上的生态翻译学，所倡导的是人学本体论，即在原文、作者、译文这三者关系中，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其投射到翻译理论上就是译者本体论。译者为大，原文退居其次，译者对原文的操纵位于翻译实践之首要位置。这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认识论，在具体的语言操作层面上必将淡化对原本文意义的遵从和忠实，造成三者关系的失衡。“译者中心”看似强化了译者的地位，实际上却使翻译本体在跨学科的语境下越来越虚化。（李晓燕等，2018）如此一来，作者的神明地位也将不复存在。可见这一理论本身缺乏本体论的回归，和中国古典生态思想中讲究整体和谐致一的核心理念是有所相悖的，因而以“天人合一”思维范式重构生态翻译观义理有夯实其理论依据和建构意义。

2.1 “天人合一”翻译观生态义理、构式与样态

“天人合一”是我华夏传统哲学中的根本命题之一，其重点在于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趋“一”致达和谐是其根本认识旨归——趋“一”为体，和谐为用。所谓“天人合一”翻译观是基于原本文语言知性关系生态系统，让人的主体智慧参与、融入原本文语言知性关系之中，并进行整体、综合、动态诗性考量，使源语与译语的生态视域能致达

“合一”，从而神形兼备地重现原作元意义的理想境界——即“翻译之梦”。“天人合一”翻译观体现的是翻译本体论的精神本质。

“天人合一”思想给翻译和翻译行为提出了文本常量意义存在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依据，这种承诺不是以字句一一对等对译来实现的，而是在译者主体性与整个翻译生态文化环境的和谐共生中来实现的，具有建构的本质和趋向。在包通法等（2010：63）对“天人合一”认识观的理解中，“天”作为文本的元意义，是文本的常量，亦可理解是文本的整体生态关系的中和与总和；人则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作者/读者。天人互为一体，而非主客体之间的操控与趋附。若译者能将译文与原文“达致圆融化生理想状态”，并呈现原文本之本义，便可谓“合一”。

2.2 “天人合一”翻译观生态义理与“三维整合”方法论

中国哲学三大命题之一“天人合一”思想范式讲究综合整体观，蕴含着理性和诗性互为相融而致一的思辨潜能，而当代哲学建构性认识转向，亦为翻译研究由后现代解构样式回归到本体论的承诺研究样态提供了理论营养钵。语言是翻译实践行为的媒介，文化是其核心要素，而交际则是最终目的。此三维相融相合，具有联动性，几乎涵盖了言语行为的各个层面。且纵观国内外各类翻译理论下的翻译方法，无一不涉及从语言、文化、交际维度对文本生态意义进行单维度甚至是多维度的分析考量。可以说，“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从本质上体现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这个各要素互相整合、和谐统一的体系中，对译文有着整体和谐美的追求。故基于“天人合一”哲学义理的“三维整合”生态翻译观的方法论，可对翻译实践进行生态关系意义的综观整合性考量，对翻译这一人文活动实施语言层面的运作和整体致一性的生存时空关系进行分析。

“天人合一”蕴含的生态义理与翻译生态系统法则具有同构性和类比性，它讲求整体性、和谐性和致一性，这些思想精髓亦成为构建生态翻译义理的智慧来源。基于“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体系所求索的整体平衡、和谐、致一的思维构式，折射到翻译认识论即要求译者“忠实原作”为本体，同时追求人与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具体到翻译方法，即译文要进行多维度的至少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整合”的整体致一考量。应当承认，源语和译语是两个不一样的文本生态系统，两者“均涉及源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宋志平、胡庚申，2016：107）但与基于西方科学思维而衍生发展的生态翻译学不同的是，“天人合一”翻译观虽强调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但更认同“原文”的“至上”义理，其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则强调的是对文本的整体把握和体悟（其中包括对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各种关系的平衡以及变化的规律），要求从言语出发，富有灵性思维，在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下进行诗性的整合而不是选择，所追求的是各种相关因素都能恰恰调和而不是适应，从而呈现出恰到好处的和谐之“信”、和谐之“达”、和谐之“美”，其关键之处在于追求译文与原作达致和谐合一、“妙合无垠”的状态。

所以，“天人合一”观下“三维整合”的生态翻译方法论，与胡庚申（2004）所提

出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侧重角度是有所不同的。胡氏的生态翻译观是基于西方科学生态认识观的问题框架的，而本文认为，就语言（文本内部关系知性体系体现的也是其本身生存关系和生态状态）、文化（文本外部诸要素）、交际（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三维度而言，在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的前提下，这三维度应是层层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而形成的意义整体与系统，体现了译者对译文整体和谐关系意义的追求，不存在意义分割和选择与适应，至少在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皆是这样的。

由此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翻译生态智慧——“三维整合”方法论，表现为译者力求“信于原作的生态体系”以实现整体动态平衡致一态势，自觉地整体“调和”，达致和合状态，关注的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和谐致一意义的呈递。基于这一认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自觉与话语实践活动嫁接与同构，不断地对话语实践进行整体调和，尽量使译文既符合原作的一般整体本义，又符合当下译语社会整体文化诗学价值体系及生态意义。这种“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基于“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所实施的层层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整合之研究路径，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英译，体现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诗性认识范式在翻译领域里的一次探索和思考，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构式与样态。

2.3 “三维整合”方法论下的翻译话语实践

关于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类研究多为运用三维转换翻译法来衡量译文的信度和效度。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类型十分广泛，包括经典文学作品及外宣、旅游、医疗、商业、科技、电影、公示语等各类实用文本英译。蒋晓华（2009：15）借助三维转换翻译法，对中外译者的《牡丹亭》全译本进行评析，提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诸者”需要“和谐”，方称得上成功的翻译。陈锦阳（2016：42）从三维选择适应角度评价了横店影视城内公示语的英译质量，提出“多元选择适应”是提高公示语翻译质量的重要方式。可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研究证明了三维转换翻译法对于指导翻译话语实践的普适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生态路径。而“三维整合”方法论是对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法”的凝练及升华，要求译者具备整合性思维，使译文能与原文中的义、象、境达致“妙合无垠”的合一境界。如《“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下的唐诗宋词英译研究》一书对三维转换翻译法做出了整体性的诠释，并将其运用于古诗词英译经典作品的对比分析中，以构建具有华夏知性体系的话语形态和认识范式，传扬东方智慧魅力。（陈菲菲，2020）这些研究均证明，“三维整合”方法论对各类文本翻译实践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和可操作性。

3 “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之英译实例举隅

中国经典散文作品内部知性体系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精神样态，在方

方法论上体现的是讲究平衡中和，而终极目标所追求的是致达中和、一体大同的生态智慧的表征。故经典散文作品的最高艺术境界即为形散神聚，是思与美互为一体的体现，因而其英译应贯彻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整合转换，即要求译者在翻译时秉持以“原作为本体”的核心理念，在言语实践层面上贯彻中国古典文化“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精神，关注原文本语言关系生态体系，关注文本外部诸要素和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而重现原作的形神意义。具体来说，在语言层面上，译文的语音、修辞、句法结构等需达至原文本内部关系知性体系的动态呈现；文化层面上，译者需具备原文本外部诸要素的活性摄入；而在交际层面上，译者需关注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无间性互动，即运用“语言为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所实施的层层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整合的“三维整合”翻译方法，实现三个维度的相辅相成，从而使译文臻至信达美整体和谐之境。

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深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内心隐藏着一种“皈依自然之心”的“文化情结”。（贺根民，2017：65）《故都的秋》是其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情感真挚，意蕴精妙。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英译进行了各个层面各种维度的研究，但主要围绕于语言层面，并未涉及三维度整合的研究。以下笔者选取流传度和认可度较广的张培基和徐英才的译文，将其置入“三维整合”框架内分析考量译文是如何贯彻“天人合一”生态翻译观的精神格局的。

3.1 语言维——文本内部生态关系与体系的整体动态诗性整合

语言维整合转换的要义，在宏观层面上是指将原文本语言整体生态关系迁移到翻译文本中，这要求译者在这两种语言生态体系之间做出整体考量。而从微观层面上看，指在不同层面做到语言维即语言整体形式的转换。语言维的整体整合转换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实践过程中首先注重语言形式的整体有效性转换，即对语言整体形式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句式、修辞与文体风格（文本整体知性生态系统）实施整体考量和诗性整合，形成这一自觉意识，注意到这一维度对于实现与原作在语言维形神合一终极目标的重要性。

对散文文本思与美的感受首先应表现在语言生态关系之中，通过语言生态表现形式使读者形成对原作“思”的理解与审美意象，并产生思与美的追求。中国的散文作品在表征方面，特别注重音美和形美，前者需韵味十足，读之或是铿锵有力或是缠绵婉转，后者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应同中有异，灵活多变，在交错之中体现散文的美感。句行的长短、重复、对仗、排比等都体现了作者内在思想与情绪的波动起伏，这些可界定为原作文本的语言知性生态系统。因此，翻译时译者要摆脱表达形式流于凝滞的束缚，把原文的语言生态体系融化到译语中，形似服务于神似，形神互为、整体考量，最大限度再现原文语言生态整体美的所有元素，为读者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和谐思辨与审美空间。

郁达夫是善用自叙式表达方式的高手，其语言风格较为直白、朴素，直抒胸臆之

中又带着哀婉感伤之情，这是原作语言层面的知性生态体系，因而在翻译实践中，译文也应尽量做到语言整体生态关系迁移以重现原作的语言整体生态系统意义。下面笔者从义、意、形、音、韵、神、势诸方面整体考察张、徐的译文是否有重现原作的语言生态系统。

例1：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张译：Autumn, wherever it is, always has something to recommend itself. In North China, however, it is particularly limpid, serene and melancholy.

徐译：Autumn, no matter where it happens, is always appealing, but autumn in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is less diluted, quieter, and more melancholy.

原文中“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是作者的喃喃自语，三个小分句提及两次“秋天”，并用最直白的“好”来形容，体现了作者简朴的语言风格。张译和徐译均采用同样的句型格式，置以插入语，近似追随了原作意合的语句形式。后半句作者连用三个“来得”排比句，用“清”“静”“悲凉”三字点出北国之秋的与众不同，清与静之中，忽用悲凉两字打破了单字结构，呈现出一种情景互融的动态感。张译选用“limpid”“serene”和“melancholy”三词，从音节来看，前两个单词均为双音节，而“melancholy”作为多音节词，打破了双音节的延续性，可见译文作者符合原文本语言内部生态关系的整体性动态呈现，而徐译为“less diluted, quieter, and more melancholy”，词与词之间平衡已失，在义、意、形、音、韵、神、势等语言生态知性体系上的契合上不如张译。

例2：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平），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平）、钓鱼台的柳影（仄）、西山的虫唱（仄）、玉泉的夜月（仄）、潭柘寺的钟声（平）。

张译：When I am in the South, the arrival of each autumn will put me in mind of Peiping's Tao Ran Ting with its reed catkins, Diao Yu Tai with its shady willow trees, Western Hills with their chirping insects, Yu Quan Shan Mountain on a moonlight evening and Tan Zhe Si with its reverberating bell.

徐译：In the south, every year when autumn came, I would always miss the reed catkins at the Joyous Pavilion, the willow silhouettes by the Fishing Tower, the chirping of insects in the West Hills, the midnight moon above the Jade Spring, and the chiming of the bells from the Poolside Mulberry Temple.

原句连用五个偏正结构的排比句，句式划一齐整，且平仄相间，读之音律流畅，韵味盎然。张译采用四个“with”和一个“on”结构构成排比，徐译采用名词加副词短语的形式成句，均尽力符合原作的语言形式生态体系。从语言风格上看，两位译者都将北国秋日中最常见的景色用最浅白的词语呈现出来，符合郁达夫的行文习惯。张译中“the arrival of each autumn”作为无灵主语，与“put me in mind of”搭配，将北国之秋摄人心魂之美描绘得更为动人。而徐的译文更为言简意赅，分别运用“at, by, in, above,

from”，词意具有动态和谐之美，比张译在用词上要精炼到位，动态十足；音韵上抑扬交错，感染力强，无冗余滞阻之感；在句式上两两相对，交相呼应。故张译在义、意、形、音、韵、神、势等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迁移和保留上略逊一筹。可见，语言维生态系统的关注、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转换当否决定着译文重现原文语言生态系统的效度。

3.2 文化维——文本外部诸要素的整体活性摄入

语言的多样性源自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因而翻译关注语言生成的生态系统的迁移和重现。这一生态系统包含了源语生态体系中的文化取向、思维模式、情感表达等文化要素，是“天人合一”观下“三维整合”生态翻译方法论其中的一维。翻译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源语文化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文化维的整体整合转换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具备文化精神认识的自觉意识，认识到原文语言生态系统的关注和重现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在翻译过程中，保证原文本内外部文化生态诸要素在译语文本中的活性摄入，是确保文化生态系统信息传递和重现效度的重要一维。

文化维度的合理迁移与转换而后保留，能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知晓译者所要展现的原文语言生态环境，更高效地摄取文化信息的有效途径，从而可以有效达致译文的整体和谐的生态意义。若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或是直接忽视了文化因素，则会加大读者与原作者、译者之间的隔膜，导致文化误读现象频发。

再看例文，比起江南秋景的“慢”“淡”“润”，北国之秋显得更为“清”“静”“悲凉”，作者钟爱北国之秋，并非只因它的静默、雄浑之美。《故都的秋》创作于1934年，文中的故都——北平因战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寄眷恋、落寞之忧思于寥寥秋景中，因而作者笔下的北国之秋除了呈现独特的气候、地域文化，更暗含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作者的主观情思，这是原词整体知性生态系统的文化维层面意义。例1中张译“limpid”一词意为“clear and bright”，勾画出北方秋日的纯澈、明净，而徐译的“diluted”侧重于少含杂质的、稀释的淡，脱离了写作背景，不符合北国秋景的特点。再者，“serene”一词相较“quieter”犹显厚重，凸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对于点睛的“悲凉”一词，两位译者均用“melancholy”来翻译，意为“a feeling of thoughtful sadness”，将作者思忆深秋的细腻深沉表现得恰到好处，有效地整合转换了翻译生态意义中所需求的文化价值取向。

而例2中提及了北平的很多著名景点，如“陶然亭”“钓鱼台”“西山”“玉泉”“潭拓寺”等，对于这些文化景观意象，两位译家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张译属于音译，而徐译为意译。文学作品中的专有名词的翻译是否必须遵循“名从主人”或是“约定俗成”的原则，抑或可以考虑思与美兼容？笔者认为，张译的音译非但不能保证文化语境的延续性和以原文本文化维为体的翻译原则，反而有悖于散文“思与美一体”的文体原则；而徐进行意译后得到的译文如把“玉泉”译为“Jade Spring”，“潭拓寺”译为“Poolside Mulberry Temple”，反而具有诗意整合原作的文化意义和契合原作的历史文化背景意义之效用。

刘宓庆(1999: 78)所提出的“第三种文化”正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恰调和”的结果。文化维视角要求译者以诗意整合来呈现原作的整体文化生态意义,以原文本文化维为体,“恰恰调和”为用,关注源语与译语的有效调和,使译文契合原文整体生态意义中的文化价值取向,达到较为理想的翻译境界。

3.3 交际维——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无间性互动

交际目的是翻译行为的终极性旨归,也是“三维整合”转换原文本语言知性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可使操不同语言的群体在形下层面能够实现信息交流,在形上层实现无间性的精神交流。对于散文翻译,就是要实现心灵与审美的终极性交流。

也就是说,翻译事件发生中除了实现语言功能和文化内涵本质性、和合致一性的转换,译者还需关注最后一公里工程——交际层面无间性和合致一,即能否引起译文读者的致一性共鸣反应。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迁移过程中若能相应地体现出源语语言知性生态系统中所蕴含的功能,便可说其实现了交际功能。Nida(1964: 22)提出,“there is, even in case of very desperat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basis for communication.”(即便是在有天渊之别的语言与文化之间,也存在交际的基础)。对于汉语经典散文这种凝练深邃的语言生态形式,翻译的交际目的是向西方传达中国文化精神之精髓与大美,因而其译文既有应对目的语知性体系的相应和合,又有对原作“彼时彼境”所蕴含的深意整体性考量和致一性整合转换。

例1是散文的开篇之句,同样也是点睛之笔。虽然各地的秋天都很好,但郁达夫对于北国之秋却具有别样的感情。原文中的“好”并不易翻译,如若简单地译为“good”等词,就过于泛化,失去了原文的深层含义。徐译为“appealing”,意为“动人的、引起兴趣的”,与原文之意趣相符,但美中不足的此词颇具动感,与后文提及的北国之秋那清静、悲凉之特征着实不符,在交际维上未能有效呈现源语语言知性生态系统中蕴含的交际意图。张译“have... to recommend”作“有……可圈可点之处”之解,表达了各处之秋景皆有可取之处,也与原文深层交际目的含义相仿,烘托出作者更迷恋于北国之秋的“something”这一深层意蕴,给读者以文化异质感的回味,比较有效地实现了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无间性互动。

例2中所列的景点都属于北平,而很多西方读者并不了解这些景致,若不特加说明,如徐译一样,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疑惑,认为作者所怀念的每一处景点均在南方;而张译添加了“Peiping's”一词,通过增译的方式避免国外读者误解,从而顺利地转化原文本语言知性生态系统,实现了原词知性生态系统交际维的近似迁移。

可见,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度知性生态系统上实现整体性、诗性的而非机械的转换与整合,具有较高的器用功效,这也为译者进行翻译实践提出了有效路径——在翻译时需注重语言、文化和交际功能的诗性契合,对语言的表层结构进行整体和合性调整,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采用与原文近似值的表达法,使译文的整体知性生态系统与原作和合致一。

4 结 语

“天人合一”翻译观中的生态智慧对于构建和谐的整体知性翻译生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在翻译学研究框架中进行深度挖掘和思考。“天人合一”翻译观不同于基于西方生态翻译学“作者—译者—读者”这一以译者为中心的认识观,它以语言本体论的承诺为前提,承认文本常量意义的存在,关注翻译的整体知性体系,是翻译研究本体论的回归。因此,“天人合一”观下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整合”翻译方法是践行“和合致一”翻译本体论承诺的有效途径,既能为一般汉语文本尤其是经典文学文本外译言语实践提供有效的方法,也有利于构建颇具中国生态智慧形态的、把翻译语言行为看作一个整合一体、和谐致一的翻译方法论。

参考文献:

- [1] 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M]. Leiden: Brill, 1964: 22.
- [2] 包通法,孔晔君.天人合一认识样式的翻译观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 60-63.
- [3] 陈菲菲.“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下的唐诗宋词英译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
- [4] 陈锦阳.公示语翻译的“三维”转换——以横店影视城为例[J].上海翻译,2016(1): 38-42.
- [5] 蒋骁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三个英译本[J].上海翻译,2009(4): 11-15.
- [6] 李晓燕,郭满峰,龚东风.译者中心的理论缺陷——兼论“三边共生”的翻译伦理[J].上海翻译,2018(5): 12-18+94.
- [7] 刘瑾,华先发.论季羨林的翻译“和谐”观[J].外国语文,2015(4): 111-116.
- [8]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贺根民.郁达夫的魏晋名士风度[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7(1): 60-67.
- [1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12] 胡庚申.新生态主义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J].鄱阳湖学刊2019(6): 5-11, 125, 133.
- [13] 刘宓庆.文体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 [14]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4): 93-96.
- [15] 宋志平,胡庚申.翻译研究若干关键问题的生态翻译学解释[J].外语教学,2016(1): 107-110.
- [16] 吴志杰.和合翻译研究刍议[J].中国翻译,2011(4): 5-13.
- [17] 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中国翻译1999(4): 3-5.

作者简介:

陈菲菲,女,1987年8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及互动式英语教学研究。